

中国之欧洲

下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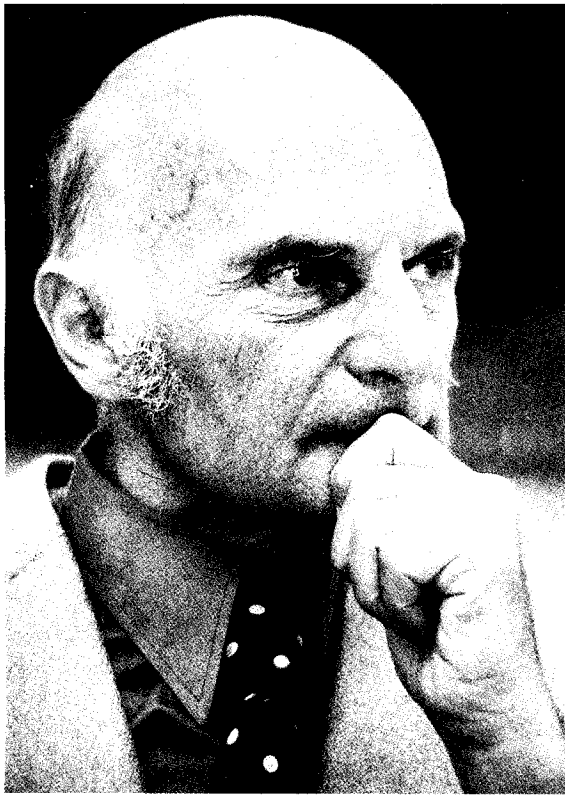
II

De La sinophilie à la sinophobie

本书根据法国 Gallimard 出版社 1989 年版本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资助

OUVRAGE PUBLIE AVEC LE COUCOURS DU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DE FRANCE



艾田蒲像（雅克·罗贝尔 摄）

艾田蒲（Rene Etiemble, 1909— ），法国当代知名作家、比较文学大师，巴黎索尔邦大学名誉教授，法国四级荣誉勋位、一级教育勋章和首届巴尔桑比较学基金奖获得者。著述宏富，除文学创作外，主要的文学评论有：《兰波的神话》（多卷）、《文学的卫生》（多卷）、《真正的罪恶》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方面的著述有：《比较不是理由》、《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世界文学论文集》、《中国之欧洲》（两卷）等。

内 容 提 要

在本书的上卷中,艾田蒲先生说明了中国何以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精神上吸引了欧洲,并且在对来自各方面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罗马帝国到莱布尼茨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在本卷中,艾田蒲先生扼要论述了欧洲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其中,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两个启蒙思想家在這一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作者还尽可能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孤儿”这一主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戏剧中的演变情况。作者认为,“欧洲中心论”是错误的,“光自东方来”也有偏颇。思想的传播是双向的,欧洲在认可中国的同时,也必然会将自已介绍给中国。

关于耶稣会传教团，狄德罗确有清醒的认识。

“他：〔…〕外国神祇谦恭地在当地的偶像旁就座；他渐渐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天，他用肘猛推同座；啪嗒一声，偶像滚落在地。人们说耶稣会士就是这样让基督教在中国和印度立住了脚跟。不管冉森派教徒怎么议论，在我看来，这种悄然无声，不流血，不伤人，也不揪一绺头发而达到自己目的的策略是最好的。——我：您方才所说的一切，差不多是有道理的。”

狄德罗著《拉摩的侄子》

R·德斯纳诠释

J·瓦尔洛和 M·罗伦斯序

巴黎，社会出版社，1972年，第166页

无论是偶尔翻阅还是出于需要,凡想通过本卷接触我的《中国之欧洲》的读者,请参阅我推出上卷时所写的那段话:倘若想要像约瑟·尼达姆^①编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②那部伟大著作那样进行研究,那至少需要有一个研究班子,用10年时间才能把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作个全面的总结,这恐怕要追溯到希腊文明年代,当时是通过丝绸之路,还要追溯到罗马文明年代,罗马的商船曾在太平洋海岸停泊,以获取中国丝绸。简言之,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试图指明在中国的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欧洲带来的一切,诸如中国的技术、思想和艺术等,那是因为我梦促动一下我梦想成立的那个研究班子,希望他们能超越我的研究水平。这里,我试图说明的,只是在18世纪,尽管人们酷爱中国的工艺品,而且还发现了中国的音乐、戏剧和有关中国科学的某些方面的情况,但并未挡住欧洲的变化,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欧洲从对中国的仰慕到对中国的排斥这一变化,由于某些“启蒙”哲学家的作用,对中国的排斥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在这些先驱之

① 即李约瑟。——译注

② 一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译注

后,紧随而上的是炮舰,在英国成功地把拿破仑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一艘艘炮舰无耻地轰击帝国,把她沦为殖民地,欧洲实在忘恩负义,因为正是这个帝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丰富着欧洲的思想、科学和艺术。人们自会明白,我之所以坚持己见,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一中国之欧洲的某些侧面进行研究,原因正在于此。尽管我了解在18世纪传给欧洲人的那部伟大的中国植物志《本草纲目》的历史,尽管我也拜读过E·罗沙·德·拉瓦莱(Elisabeth Röchat de la Vallée)有关这一问题的精彩报告^①,但我并不准备在此重新叙述它的来龙去脉!倘若我有心想就欧洲各国的情况,按国别发表类似俄国人在1969版发表的研究成果(我在上卷的序中已经提及,俄国人发表了两大卷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与文件),那至少需要10卷的篇幅,需要付出20余年的心血。仅就英国而言,自我发现丹尼尔·笛福的断言之后所进行的调查,以及其他人的,如欧文·奥尔德里奇(Owen Aldrige)的调查结果,哪怕再简缩,也可轻而易举地写上30来页。笛福曾断言,若将中国与他的国家和国民作一比较,那中国便会自我暴露,给人以极不光彩的形象,中国人程受颐(Ch'en shou-yi)于1935年在天津发表了《丹尼尔·笛福——对中国的一位严厉的批评家》,公开了这一所谓的形象。在这之后,我还看过不少有关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中国献给英国人的精神礼物和其他赠品的文章。关于儒家在18世纪的英国的情况,我自然在《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77年)中读过埃

^① 见《中国植物志(本草纲目)在18世纪流传欧洲的始末》,载《第三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1988,尚蒂伊),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8年,第177—194页。

德蒙·利茨(Edmund Leites)的那篇论文^①。

我也没有忽视欧文·奥尔德里奇的论文,他是关心远亚与欧洲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比较文化专家中的一位,他的那篇题为《启蒙时代的英国文学中对中国的看法》的论文见于1986年问世的《世界文学的重现:亚洲与西方之研究》^②。我们怎会忘记 John T. 普拉特(John T. Pratt)在《中国与不列颠》一书中明智地承认中国所赠与欧洲的一切,比如茶,那是在17世纪初由荷兰商人介绍给欧洲人的。普拉特毫不犹豫地写道,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有负于那个如此遥远的国度。对一个英国人来说,没有茶的日子,该是多么“烦闷”(在那部英语著作中,用的是法语的“ennui”一词)啊!普拉特也没有忘记在17、18世纪“流入欧洲的那些数量不断增加的”中国手工艺品,诸如瓷器、漆器、玉器及景泰蓝等。他同样也知道中国从来没有厚颜无耻地把人类看作“宇宙的最终目的”(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universe),并为之而感到庆幸;他也许也有失误之处,如他曾自问为何“她〔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会如此之小”(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why her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en so light),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得出与此较为矛盾的看法,他承认一种“对来自中国的东西——包括哲学——的狂爱之潮席卷了欧洲,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a craze for Chinese things——including philosophy——swept Europe, and particularly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后来,这致使普拉特为皮勒芒特(Pillement)于1770年出版的《中国茅屋》大声叫好。他还有

① 《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77年),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0年,第65—81页。

② 此研究文集的单行本得益于他,他的文章的页码为1—25页。亚太议员联盟亚太文化中心出版,第14卷第2号,1986年。

别的失误,那就是他认为这一狂爱中国工艺品的欧洲对孔子却似知非知:然而在1691年,就在伦敦出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伦理学》,实际上,这部书不过是三年前在阿姆斯特丹问世的那部法文名叫《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的著作的转译本。此外,埃德蒙·利茨也分别以英法文发表过《在18世纪的英国的儒家:自然伦理与社会改革》一文^①。

1977的那届研讨会特别提供了一份在美国完成的有关中国在启蒙时代的作用的研究成果录,同时还提供了一份题为《启蒙时代对中国的理解: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成果。尽管我对沃尔特·沃森(Walter Watson)的报告并不完全赞同,但不管谁接触类似的研究,这一题目是绝对成立的。证据之一就是在30年前,我在巴黎大学执教的初期就涉及过这一题目。在此书的上卷中,我说明了中国何以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精神上吸引了欧洲,而在本卷中,我则要扼要地叙述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构成了这一具有双重价值的中国的两个支柱。其中,我还要尽可能谈一谈“中国孤儿”这一主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戏剧中的演变情况。倘若人们认为智慧之光的传播总是由东向西进行,并认为“光自东方来”(ex oriente lux)这一格言总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对思想的传播史就有可能完全不了解了。如果说中国人给予了我们许多的话,那他们至少也接受了一些东西。毫无疑问,耶稣会士们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在欧洲介绍了中国,倒不如说是把西方介绍给了中国人;但是,若我们抹杀了他们为介绍中国思想所作的贡献,那就大错特错了。韦拉朗先生(M. Verhaeren)给北京的

^① 《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海蒂伊,1977年),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0年。法文本见51—64页,英文本见65—81页。英文本中有一些注释,但在法文本中则没有。

那些耶稣会士们一点一点搜集而来的图书精心编写了一份目录，并且公开出版，耶稣会的雷迪夫神父(P. Rétif)在一部名叫《在中国的一座复兴书馆》^①的著作中对韦拉朗先生所编的图书目录的价值作了评价。

这一“北堂书馆”拥有耶稣会士们认为对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很有用处的各种欧洲图书：“它在两个互不了解的世界之间起到了联结线的作用：对远亚而言，它为传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出了贡献；而对西方来说，它则为介绍远东的人文财富给予了间接的帮助^②。”

圣方济各·沙勿略本人对这座藏书馆的图书是有选择的，他曾在远东给上司写信：“我希望这些教友不要对天文学一无所知〔…〕切勿把不具备渊博学识的神父派往日本或中国。”后来，利马窦坚持按他前任的意图行事，有幸实现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计划。他每次给欧洲写信，要求给他的书馆提供图书，给予帮助时，他总是再三强调，要求得到类别尽可能丰富繁多的图书。“他因此而想完善自己的知识，引起与他过从甚密的中国文人的钦佩与好奇^③。”在他看来，好奇与钦佩是人间可把不信教之人引往上帝的众多道路中的两条。在现存的《北堂书馆图书目录》中，还可找到当初建馆时第一批藏书中的几部图书，书馆建于1605年，据某些学者，确切的日期为1605年8月27日。常来拜访利马窦神父的中国文人确实对这座藏书馆惊叹不已，里面藏有西方有关天文学、几何学和钟表制作术的论著，也有宗教、哲学、伦理和历史书籍。利马窦

① 请参见《北堂书馆图书目录》，北京，遣使会会士印刷社，1944—1949，有关这一专题，请参阅J·代尔涅的文章：《震旦大学学报》，上海，1949年，第262页。

② 见雷迪夫一书第113页。

③ 见雷迪夫一书第114页。

死后,龙华民神父虽然在某些方面否认了他的前任的学说(尤其在有关中国某些玄学概念的含义方面),但有关北堂藏书馆的事业却是继承了下来。正是为了这一事业(但并非仅仅为此事业),他把金尼阁派回法国,后来,金尼阁通过海路把近七千册西方图书运到了澳门,继而又通过水路运送这批图书。在几个世纪中,这座藏书馆历尽了劫难。1644年,满族人灭了明朝,火烧北京,然而大火中耶稣会士们的藏书却丝毫未损,雷迪夫神父高兴地称之为“几乎是奇迹”。可是1812年那场大火,他却不敢再称为“奇迹”了,东堂的藏书馆在大火中损失惨重,当时,东堂是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第二个传教要地的常驻点。在19世纪,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耶稣会士们曾一度把藏书馆残存的图书委托给俄国的东正教传教团保管;三十二年后,即在1860年才重新收回。1862年,蒂埃里(M. Thierry)编写了一个手抄目录,全部藏书共计5930册。现存5133册。在17世纪,一座拥有七八千册图书的藏书馆,我们假设是由各类图书组成的,那它足以使人们对欧洲的思想、宗教和科学有个概要的认识。由于我在上文刚刚提及的那些事变的缘故,我们无法一一弄清中国人在耶稣会士们那里有可能发现的一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个近似的了解。在书目中,没有列入培根、伯麦(Jakob Boehme)、布鲁诺(Giordano Bruno)、霍布斯(Hobbes)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的作品,对此,谁都不会感到奇怪。无论是实证思想,异端的神秘主义,还是当时要受到焚烧制裁的严格的理性思想,都无助于实现耶稣会士的目的。因此,你也别指望在书目中看到路德和加尔文的书。但是,《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①却使蒙田得以进入中国:在北堂藏书馆里,可以读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先驱库

^① 此为蒙田《随笔集》中的一章,抨击了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译注

萨的尼古拉斯(Nicolas de Cuse)、哲人、名医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e)、卡尔达诺(Jérôme Cardan 1501—1576)、勇敢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乔凡尼(Giovanni Pic de La Mirandole 1463—1606)、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以及其他学者的书籍,如克雷芒八世的医生切萨皮诺(André Césalpin)、卢万公教大学教授利普修斯(Juste Lipse 1547—1606)、素以言辞尖刻闻名的瓦拉(Laurant Valla 1407—1459)和皮埃尔·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等”。伊拉斯谟的大名也列在书目上,上面还列有勒菲弗尔·戴塔普尔(Lefèvre d' Etaples)的名字。雷迪夫神父还告诉我们被列入教廷禁书目录的有关图书在这座藏书馆里全都经过“评注与校改”。这是自然的事。此外,耶稣会士的护教论主要是建立在博学者和能工巧匠的成就之上,而不是以哲学家为基础。在天文、数学、医学、自然科学方面,他们的藏书馆给中国人提供的几乎是当时的西方世界所创造的一切最优秀的成果;凡是与航行、建桥、地球仪、自动木偶以及风车制作有关的书籍,他们无不热烈欢迎;甚至对有关介绍电力基础知识的书籍,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一切无不给神父们提供帮助,A、M、D、G^①。

人们也许希望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我相信若在中国进行认真的研究,那定将有助于发现这一藏书馆所起的作用: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中国的科学与思想的发展方向。目前,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我们仅仅知道穆斯林和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对这门迫使他们修改历法,并因此而改变世界时序的外国科学,并不是痛痛快快地接受的。为了战胜非基督教徒,在北京的那些耶稣会士们给伽利略写信,在许诺保守秘密的同时,请伽利略为他们计算某部中国

^① 拉丁文,意为“为了上帝的更大荣耀”。——译注

书籍中提及的某次日食的时间,想想这种做法,确实有趣。那些完全同意教廷以真理的名义对学者伽利略作出判决的人们,竟然采取这种做法,真是真理的莫大胜利!要是我依据的材料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是在1612年了解到了伽利略的学说;1614年,马尼埃尔·迪亚兹神父(P. Manuel Diaz)在他对天体的解释中巧妙地提到了伽利略的学说;同年,耶稣会会长发布禁令,严禁会士们传播伽利略有关天体之本质的思想。神甫们因此而左右为难!为了征服中国,让中国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不得不向中国人介绍比穆斯林天文学更胜一筹的天文科学,可会长却禁止他们使用这一最为有效的武器。我们都读过《修会省会长嬷嬷》,不难猜想耶稣会士们是以何种巧妙的手段摆脱困境的:在北京观象台,他们利用了迪亚兹神父的论著和伽利略的发现;然而他们在公开场合传播的则是托勒密体系^①。差不多到了1865年,天主教传教士们才向中国人宣布了开普勒(Kepler)和伽利略的观点;当时,我们的炮舰正在向中国人揭示我们文化的另一个侧面。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适时开始了改造中国的事业,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版了利马窦神父亲笔译成汉语,并于1607年出版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篇)。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着对技术的酷爱,这是利马窦神父和他的继承者们在中国取得的唯一的胜利。请看西方的捍卫者之一康有为在过去并不久的年代所说的一段话:“外部世界业已彻底改变。我们务必往外看,尔后据我们所见改造内部。中国目前之无能源自其一惯的闭关锁国,这先后持续了数世纪之久。民族正在因窒息而死去。砸碎我们的锁链!给我们空气!……利马

^① 描述太阳、月球和行星位置及视运动的一种宇宙理论模型,为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托勒密于公元140年前后所提出。——译注

窦、熊三拔、J·阿伦(J. Alen)、南怀仁和汤若望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幅世界地图,给我们解释了星球的运行,修定了我们的历史,为了赢得小人物的同情而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些善事。”利马窦、熊三拔、南怀仁、汤若望,这一个个全是耶稣会士!

仅凭北京的那家藏书馆,恐怕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因为懂法语或拉丁语的人为数寥寥。但是,耶稣会士在创建这家藏书馆的同时,用汉语翻译、出版了许许多多的科学著作,并在这些译本的基础上,自己动手用汉语编撰原本。早在17世纪,基歇尔神父(P. Athanase Kircher)就立了第一份书目,列入的就是我们的那些神父们为扩大中国教堂的势力而编撰的书籍(见基歇尔那部有关中国的书的第158页和后面几页)。亨利·科尔迪埃(Henri Cordier)那篇介绍《17、18世纪欧洲人在中国发表的著作目录》的文章见于由勒鲁出版社于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东方文集》的第495—546页。此外,还可参阅下面这一书目:*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e Societate Jesu qui a morte S. Fr. Xavierii ad annum MDCC-CLXXII Evangelio X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 Pars Prima*, Shangai Typis, A. H. de Carvalho, 1873. (《自沙忽略逝世后至1872年在中国致力于福音传播的耶稣会神父与会士著作目录》),此书目于1873年由A·H·德·卡瓦勒霍(A. H. de Carvalho)在上海出版。科尔迪埃编写的书目虽然远远谈不上齐全,但欧洲人在我们关心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发表的著作已被列入二百种之多。

自科尔迪埃的《书目》之后,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给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有:《1513—1688年间改译成汉语的欧洲著作》,见《中国资料集》(1945年,第1—57页,309—388),并附有书目,见14—15页;A·M·科隆贝尔(A. M.

Colombel)神理学博士所著的《江南传教史》，石印(上海版，卷一，第567—587页)；亨利·贝尔纳〔大师〕所著的《第一个名士院与中国》，见《马可·波罗传》(卷二，上海 No. 3 第21—34页)。全部书籍远不止100种，据有关学者，耶稣会士在中国发表的著作达300种，甚至有人说多达363种。我们怎能指望全都了解个一清二楚呢？这些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以汉语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因此，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凡事都以孔子发誓之时，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有的甚至还是孔子的门徒，却抛弃了孔子，投到耶稣—基督教的门下。传说耶稣会的毕方际神父(P. Sambiasi)用汉语发表了《灵言蠡勺》一书，可汉语中没有与天主教关于“Ani” (灵魂)这一概念完全对应的词，神父无奈，只得用 ya ni ma 三字来传译āme一词，然而所谓的 ya ni ma 三字，只不过是拉丁文“anima”一词的近似音译。后来，一位王子读到了《灵言蠡勺》，当他读到那位耶稣会士用以传译“āme”一词的“ya ni ma”三个音译的所谓汉字时，突然受到神启，惊叹不已，竟把连他这个中国人都绝对看不明白的纯粹拼凑而成的三个字当作灵魂存在的证据。于是，这位名叫 Sang kong-ye(尚孔易)的王子归依了天主教。这确实是“智慧之光的传播”相当有趣的效应；这位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灵魂”的理解自然不比马勒伯朗士对“理”与“气”的理解强多少。

实际上，尽管康熙在17世纪末发布了宽容的圣旨，允许中国人自由信仰基督教，同时给了传教士们自由传播福音的权利，但是，天主教在中国并无多大发展。在中国，耶稣会士们往往是以科学与技术专家的面目出现的，说到底，他们也确实是科学与技术专家。为了使新门徒们对天主教怀有好感，耶稣会士们毫不犹豫地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汉译本上印上基督的字样；他们精明地打着小算盘，既然中国人被几何学那不可否认的真理所吸引，那他

们也许会认为宗教之真理也同样是不可置疑的,因为这同一批耶稣会士向他们保证两者都是可信的。耶稣会就这样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数学、宇宙志、解剖学和技术书籍。除了宗教书籍之外,利马窦神父还发表了《几何原本》(即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见国家图书馆、法国标准汉语藏书号 2959—2960);后来又出版了《同文算指》(国家图书馆,法国标准汉语藏书号 3204);熊三拔神父丝毫不怕有失身份,用汉语写了《泰西水法》(国家图书馆,法国标准汉语藏书号 3209),金尼阁神父编写了对数的书籍,邓玉涵神父(P. Terenz)编撰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和论人体的著作。另有一位耶稣会士编撰了《职方外纪》和《西学凡》两部书,并因此而成名。这就是艾儒略神父(P. Giulio Aleni),他除了编写这两部书之外,还撰写了近二十部护教论著作,其中有一部教理书,一部论弥撒的书,一部论忏悔的书,还有几篇对话录,写的是作者与一位中国人就基督教的对话,该书于 1847 年重印。(拉莫特·勒瓦耶将孔子称为东方的苏格拉底,而据说中国人则以艾儒略神父为殊荣,称他为“西方的孔子”。这种相互的称呼意义重大。)我们千万别忘了南怀仁神父,尤其别忘了汤若望神父,他们这两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在中国的宫廷为法国和欧洲争得了多少荣誉!南怀仁神父在北京用拉丁文主编了多部天文学著作,还用汉语编写了一部《宇宙志》和一部论温度计用途的书。至于汤若望神父,他在中国发表的著作大多是有关数学和天文学的。他用汉语编撰了《远镜说》一书,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基督的叛逆。汤若望神父的《天文百科全书》在中国历法的改革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对这部百科全书,贝尔纳-梅特尔神父(P. Bernard-Maitre)作过精彩的研究,详见《中国资料集》(卷三,1938 年,第 1、2 分册)。耶稣会士在中国地图绘制术的

创建方面也起过作用,就此可以说的自然也很多^①。1655年,《中国新地图集》在维也纳出版,这对利马窦和金尼阁神父来说是个胜利。此后不久,巴多明神父(P. Parrenin)着手《中华帝国与鞑靼地区图集》的绘制工作。康熙皇帝下令由雅尔图神父(P. Jartoux)对中国各地区的地图进行了统一的修订。正是从那时起,满清政府对俄国在远东的野心感到不安;后来导致了战争,最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88年),了结了战事。康熙于是特别注意了解有争议地区的情况以及边界的界定问题,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了。对处于中国与黑海之间地区的情况,康熙皇帝不向西方的耶稣会士讨教,还能向谁讨教呢? 1727年,在俄国大使的来访期间,康熙的第13个儿子(在他兄弟雍正的朝中做大臣)召见了戈比尔(Gaubil)、德·马亚(de Mailla)、巴多明和徐日升(Pereyra)等神父,请他们绘制一幅黑龙江、北冰洋和东海之间区域的地图和一幅包括西伯利亚、俄罗斯和圣彼得堡地区的地图。次年,根据皇上的命令,戈比尔神父又绘制了一幅“与俄罗斯、土耳其、波斯和鞑靼接壤省份”的地图。所有这些情况,我是在贝尔纳-梅特尔神父的文章中获得的(见《中国与邻国的地图绘制科学自16世纪至18世纪末的各个发展阶段》,见《中国资料集》卷一,第2分册,第428—477页),贝尔纳-梅特尔神父就此还这样说过:“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欧洲对远东的情况如此了解。”

在中国思想付出了被部分曲解的代价,但有力地影响着欧洲的时候,基督教对满清的知识阶层的影响却微乎其微。雅克·谢和

^①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马塞尔·戴斯顿伯(Marcel Destombes)的文章:《王潘(译音)、梁寿(译音)和利马窦:论1593—1703年的中国地图绘制术》,载《第三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80年),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3年,第46—62页。